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論 解 構

結構主義之後的理論與批評

〔美〕喬納森·庫勒 著

陸揚 譯

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論 解 構

結構主義之后的理論與批評

〔美〕喬納森·庫勒 著

陸 揚 譯

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Jonathan Culler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論 解 構

結構主義之后的理論與批評

著者：[美] 喬納森·庫勒

譯者：陸揚

出版者：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九十三號

電話：6706633

傳真：6701383

印數：1100册 字數：205千

一九九三年八月初版

港幣二十五元

定價：人民幣五元七角

ISBN 962-450-393-1/D · 30682

译者序

1979年，乔纳森·库勒在其《德里达》一文中，曾经这样评价了这位解构理论的创始人：目前来估量什么是德里达的最为有力的贡献，还为时过早。待到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后再往回看，他会证明是开创了哲学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吗？他会证明是开创了一种新的阅读和阐释模式，一种关于文本性质的理论吗？库勒说这一番话时，正是解构理论方兴未艾，笼罩在一层神秘光影中的年代。四年之后，库勒写出了这一本被公认是评述解构理论的权威之作：《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或者说解构主义，自从六十年代末叶在法国悄悄崛起，很快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激起反响，数年间迅成燎原之势，席卷欧美，波及几乎每一个文化领域。以至有人说，虽然很少有人从头到尾通读过德里达的《论文字学》、《播撒》、《丧钟》这类大名鼎鼎的经典，但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它们的影响。这也并非言过其实。因为人无论或有同感，热心为此种理论洞开门扉，还是把它视作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有目共睹的是它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人文科学的思维模式和方式了。

本书作者乔纳森·库勒，1944年出生于克利夫兰，哈佛大学毕业后，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比较文学，获博士学位。库勒先后在一些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中供职，31岁时已是著名学府耶鲁大学的教授，1975年获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洛威尔奖，现执教康内尔

大学，兼任《新文学史》、《结构主义评论》、《今日诗学》等多种杂志的编委，是当今西方文学批评界声名显赫的一位大家。库勒众多的著述中，我国读者一定记得他七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结构主义诗学》，彼时库勒算得上一个正统的结构主义者，然而他对诗的看法却有独到之处。比如他认为一段文字是不是诗，不一定取决于语言本身，只要读者当作诗来读，散文同样能够入诗。又如他强调诗的比喻义和言外之意，以及诗的文字游戏性质等等。这当可以解释他何以象许多著名的结构主义者那样，终究是告别了这个阵营。

库勒说，这本《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是《结构主义诗学》的续编。两者方法框架上的差异，则在于前者是介绍，后者是参与。其实，不论是介绍或分析一种理论，假如不是抱着理解和同情的态度，而是戴着有色眼镜专门挑刺，无论如何是难得要领的，这一点库勒本人深有体会。从本书的编排体系来看，第一章可以算一个前奏，分别讨论了结构主义同后结构主义的关系问题、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和有关怎样阅读的一些理论。理论未必是枯燥的，这一点读下来便见分晓。第二章以下即是正文，分别阐述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和这些理论能怎样被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实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库勒在本书中所举的一些例子，比如尼采倒因为果的例子，本身亦已成为一种经典了。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久被认为是一种说不清的理论。据说用语言来传解释构，其“荒唐”程度一点不亚于被德里达视为眼中之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语言本身南辕北辙，辞不达意，传达一些浅显的道理已每每是疑窦丛生，怎么能指望它来说清远为艰涩的解构之道呢？这真有点“道可道，非常道”的意味。然言虽不能言，非言无以传也。难道老子不是也用他那洋洋洒洒五千言的《道德经》，来传释那个作为“万物之奥”的“道”的吗？

相信本书的读者掩卷之后，能够明了解构是怎样一种理论，而对西方柏拉图以还的理性主义传统，也能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

目 录

译者序	(1)
序	(1)
引言	(8)
第一章 读者与阅读	(21)
一、新的机运	(21)
二、作为女人来阅读	(31)
三、阅读的故事	(53)
第二章 解构	(71)
一、文字和逻各斯中心主义	(75)
二、意义和可重复性	(95)
三、嫁接	(116)
四、惯例与倒置	(137)
五、批评的结果	(159)
第三章 解构批评	(203)

序

本书是拙作《结构主义诗学》的续编，虽然方法和结论上，都大相径庭。《结构主义诗学》旨在全面审视一种批评和理论文学，认同它们最有价值的建设和成就，并且将它们介绍给对大陆批评鲜有关关注的英美读者。今天，情况改变了。且不论介绍工作多有人为，纷争也迭出不穷。在八十年代初叶来写一种批评理论，不再是介绍陌生的问题、方法和原理，而是直接参预一场生机勃勃，难解难分的论战。下文我拟就近年来理论文字中我认为最有活力，最有意义的内容作一些描述，同时澄清一些似乎是经常被忽视和误解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理论纷争，以及本书所属的那一类文字的地位。英美批评家常常认定文学理论是仆人的仆人：其目的在于辅佐批评家，而批评家的使命则是通过阐释经典，来为文学服务。检验一种批评文字，因此是看它是否成功地提高了我们对文学作品的欣赏水平；检验理论，亦是看它是否成功地提供了一些工具，以有助于批评家推出更妙的阐释。“批评的批评”，就象人们时而这样称呼它，是被定位在远离对象本身的两个范畴，唯其有助批评走在正道上边，方才显得有用。此种观点十分流行。韦尼·布思，一位在文学理论领域卓有成就的人物，觉得很有必要为他的所为作一番辩解：“谁真正愿意泡制一部时下的行话完全可能叫做元元元批评(meta-meta-meta-criticism)的巨著？”他在给一部文学理论的大部头著作所作的序中说，“但是我明白，我本人之身不由己越钻越深，

究其原委，完全是为了直面当今文学和批评的现状。”^①

如果说批评理论的目的，经常被视为在于判定某些特定的阐释程序合法与否，那么此一观点无疑便是新批评的馈赠。新批评不仅要人相信，文学研究的目的，即是文学作品的阐释，而且通过界定进而驱逐意图谬误——这一它最是值得纪念的理论工程，暗示文学理论是旨在消除方法错误以使阐释走上正道。虽则近年已有与日俱增的证据显示，文学理论应作别论。文学理论的著作，且不论对阐释发生何种影响，都在一个未及命名，然经常被简称为“理论”的领域之内密切联系着其它文字。这个领域不是“文学理论”，因为其中许多最引人入胜的著作，并不直接讨论文学。它也不是时下意义上的“哲学”，因为它包括了黑格尔、尼采、伽达默尔，也包括了索绪尔、马克思、弗洛伊德、高夫曼(E. Goffman)和拉康。它或可称为“文本理论”，倘若文本一语被理解为“语言拼成的一切事物”的话，但最方便的做法，还不如直呼其为“理论”。这个术语引出的那些文字，并不意在孜孜于改进阐释，它们是一盘叫人目迷五色的大杂烩。理查·罗蒂说：“自打歌德、麦考莱(Macaulay)、卡莱尔和爱默生的时代起，有一种文字成长起来，它既非文学生产优劣高下的评估，亦非理智的历史，亦非道德哲学，亦非认识论，亦非社会的预言，但所有这一切，拼合成了一个新的文类。”^②

这个新的文类显然是异质性的。其中的具体著作联系着其它一些知名领域：伽达默尔于德国哲学一个特定的分支，高夫曼于经验社会学研究，拉康于精神分析实践。“理论”之为一个文类，是因为其著作作用方式的缘故。各类专门家报怨说，此一文类声称所辖的那些著作，是偏离了该学科的母亲在被人研究；学理论的学生读弗洛伊德，却不顾后来的精神分析研究反驳了他的原则；他们读德

① 韦尼·布思：《批评理解：多元主义的力量与局限》，芝加哥1979年，第xii页

② 罗蒂：《职业化的哲学与超验主义文化》，《乔治亚评论》，30(1976)，第763-764页。

里达，却对哲学传统一无所知；他们读马克思，却不对政治及经济状况的描述另作研究。作为“理论”这一文类中的成员，这些著作是超越了它们被估量于中，并且有助于认同它们对知识之确凿贡献的学科框架。换言之，分辨此一文类成员的，在于其功能不是作为某个学科领域内部的阐释，相反成为一种重述，从而对学科边界提出挑战的那种能力。故我们归入“理论”的那些著作，都有本事化陌生为熟识，使读者用新的方式，来思考他们自己的思想、行为和惯例。虽然它们可能依赖熟悉的阐发和论争技巧，但它们的力量——这正是它们被置于上述文类的缘由——不是来自某个特定学科的既定程序，而是来自其重述中洞烛幽微的新见。

此一文类近年来的发展中，黑格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盖过了麦考莱和卡莱尔，虽然爱默生和歌德时不时出演着令人尊敬的角色。理论著作可能处理的题材，并无明显的限制。近年其理论力度足可列入这一文类的著作有迈克尔·汤普生的《垃圾理论》、道格拉斯·霍夫斯塔德的《哥德尔、埃塞尔、巴赫》、丁·麦康纳尔的《旅游者》。至于这个吸收了法国人所谓的“人文科学”中最富创见之思想的领域，之所以时而被称为“批评理论”，甚至“文学理论”，而非“哲学”，则要归功于英美两国哲学与文学批评近年来出演的历史角色。理查·罗蒂本人是一位杰出的分析哲学家，他说：“我觉得在英国和美国，哲学已被就其主要文化功能而言的文学批评所替代——作为年轻人自我描述其与过去不同处的一个源泉……这大致是因为盎格鲁-撒克逊哲学中的康德主义和反历史主义趋向。黑格尔未被忘却的国度中，哲学教师的文化功能是判然不同的，而更接近于美国文学批评家的地位。”^①

文学批评家对上述看法，多半要抱怀疑态度。因为他们从吵吵闹闹欲写出自身与往昔之不同的青年那里，听到的更多是责怪他们漫无准的，且寄生了他人的诘难，而不是赞扬。要是罗蒂是一位

^①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境》，普林西顿 1980 年，第 168 页。

批评家而非哲学家，他也不会这样毫不迟疑地断言批评替代了哲学。比方说，人很可能怀疑，年轻人为描述他们与过去的不同，是转向了广告及流行文化，而非文学理论。虽然有两个迹象可能支持罗蒂的观点：其一，对理论倾向的批评频频发生的攻击，指责研究生们机械模仿某些模式，追逐一些他们还太稚嫩无知而无法把握的概念，竞相标榜某种虚幻的或一时流行的新奇，这是暗示近年来批评理论的威胁，与它对年轻人的特殊诱惑力直接有关。与此相反的看法，则认为理论的危险性，适在于它可能出演罗蒂所言的那一种角色，作为知识青年的营养库而促使他们同过去道别。其二，这似乎的确也是一个事实，近年欧洲哲学——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萨特、福科、德里达、塞瑞(Serres)、里奥塔德(Lyotard)、德勒兹——是通过文学理论家而非哲学家而入口了英美。就这一意义上言，正是文学理论家，在建构“理论”这个文类中，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进而视之，且不论罗蒂对批评的青垂是对是错，还有一些理由可以证明，何以由文学理论在行将确定的“理论”文类中来出演中心角色，并非不合适。首先，有鉴文学以全部人文经验为其题材，尤重于经验的整理、解释和连接，诸色纷呈的理论工程之受益于文学，其结果亦有似于关于文学的思考，便非事出偶然。由于文学分析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分析人类心理复杂万状的表现形式，分析物质条件对个人经验产生的影响，最是有力透彻贯通这些问题的理论，自然将引起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兴趣。文学的综合性，使它有可能将一切竞新斗奇或骇人听闻的理论，纳入文学理论之中。

其次，由于文学的探索直达智穷计尽，文学鼓励专执于或有涉于理性、自我反思，及意指之最一般问题的理论探讨。社会及政治理论家阿尔文·葛尔德纳(A. Gouldner)，将理性界定为“这样一种能力：它可使迄至今日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东西变得疑云密布，可使在先仅仅是被使用的东西让人反思，可变素材为主题，可批判地

审视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一理性观，是将理性置于关于我们的思考的思考能力之中。理性作为我们立足基础的反思，是设定了一种能力，以供言说我们的言语和支撑于下的事实。理性因此是位于元交流之中。”^① 承认文学作品有能力，突现在先可能是被想当然的事物，包括语言以及通过它们我们来组构世界的各种范畴，文学理论之将堪称范式的文学之反思理论化的努力，理所当然便是属于反思及元交流的那一类问题。文学理论因此趋向于在它的轨道中，纳入关于交流的框架及交流问题的形形色色的思考，以及其它无尽无涯的反思形式。

再次，文学理论家多半特别易于接受其它领域中的新理论发展。这是因为他们不似这些领域中的专门人士，执着于一端而不及其余。虽然他们也热衷于自己的科学，从而会抵制一些离奇古怪的想法，但他们会欢迎质疑当代正统心理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哲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等等的基本假设的各种理论。这使理论，或者说文学理论，成了一块热闹非常的竞技场。

在这等情况下，讨论十年来的文学理论，便无有可能来苛求全面——被纳入文学理论的理论文字，其范围何其宽广。以解构理论为我的论述中心，我是意在说明，它不仅是近年来理论中冲锋革新的主导力量，而且关牵到文学理论中一系列最为重要的问题。我腾出大部分篇幅来讨论德里达，是因为我发现他的文字亟须说明。我希望读者将会发现，这些说明是富有价值的。这些文字当然不是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但是我可以求诸一位自命为批评史家的人物，来为我的做法辩护。此人是弗兰克·伦特里夏，他说：

在七十年代初叶的什么时候，我们从现象学迷梦的教条卧室中一觉醒来，发现一个新的存在已绝对把握了我们的先锋批评想象，这便是雅克·德里达。说来叫人吃惊，我们得知，

^① 葛尔德纳，《意识形态与技术的辩证》，纽约1976年，第49页。

虽然有一些文字大致可概括出相反的结论，他没有带来结构主义，而是带来了所谓的“后结构主义”。保罗·德·曼、希利斯·密勒、杰弗里·哈特曼、爱德华·萨伊德，以及约瑟夫·里德尔（Joseph Riddel），所有这些六十年代均迷醉过现象学倾向人物，其文字生涯朝后结构主义方向的转移，道出了全部故事。^①

这自然不是全部故事，上面这段神经兮兮的文字正是显示了种不惜一切代价来编造历史的欲望。但是，把德里达神化为一新的绝对存在，则暗示了人可以运用解构理论来解决一系列问题，诸如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诗学及阐释、读者与批评元语言等等。过去十年间关于理论的文字中，我虽然疏漏了许多重要的人物，比方说罗兰·巴特——他的例子我可在另一本书中写上一大篇来作补偿；但其他人物，我则不必致歉，而只能说，解构理论轨道之内的批评家，也可能象其外的批评家一样受到冷遇。

但是，一切关于当代批评理论的讨论，必然直面后结构主义这个混乱且被混淆的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解构理论与其他批评运动之间的关系。引言部分从一个角度谈到此一问题，第一章又换了另一种角度。结构主义、现象学、女权主义和精神分析批评家，近年来都一致认可强调读者和阅读。分析这些阅读理论中出现的问题，乃是第二章中解构理论的探讨搭起舞台。我无意就德里达的文字作编年史的系统的评述，而是按照主题范域，和它们对文学批评及理论发生的影响，来对它们作出分析。在这个拉得很长的分析过程中，为求明晰，我冒了重复的风险。要是我有失误，也请读者原谅。第三章分析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日益扩展的阵营中的一些理论，以求见出其中的重要人物，以及变化中的不变。

感谢所有近年同我讨论过这些问题，以及就他们的文字回答

^① 伦特里夏，《新批评之后》，芝加哥1980年，第159页。

过我的问题的人士。类似本书这样的情况，责任问题是极成疑问的，读者将会看出，不可能高举一个雅克·德里达，叫他对我从他名下的著作中生发出的一切涵义负责。我要坚持说，本书多受惠于康奈尔大学几位同事的意见，他们是劳拉·布朗、纳尔·赫兹、玛丽·雅各布斯、理查·克林、菲力普·刘易斯，和马克·塞尔策，特别是辛西娅·切斯，她的文字促成了这部著作，她的阅读也纠正了它。我还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它给了我一笔基金，使本书得以起步，可是老天，未使它得以完成。

乔纳森·库勒

引 言

如果说，近年来批评论争的关注者和参战各方能有任何共同语言的话，那便是当代的批评理论，盘根错节，越见混乱了。过去，一度可以设想批评是一种单一的活动，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近年辩论的尖锐程度，所示的则是相反：构成批评领域的全是些竞新斗奇，互不相容的活动。甚至开列一连串名单——结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多元论、女权主义批评、符号学、精神分析批评、阐释学、对照批评，以及接受美学等等——也不过是就康德称之为“数学的崇高”的无限，不完全的匆匆一瞥而已。凝神观照一片威胁着淹没我们感受力的混沌，如康德所示，会使人豪气油然而生。然而大多数读者只是迷惑困顿，并不感到肃然起敬。

本书虽不敢说一定让人敬畏，却有意同困惑作一番较量。批评论争应当充满生气，而不是如过去经常出现的那样，使人昏昏欲睡。有人熟读当代的理论，还每每难于确定要点，以及针锋相对的理论何处、怎样互不相让。这样情况下，批评家就义无反顾要做出阐释，尤其是当阐释能使从事文学的学生和教师，从中收益的时候。须知，他们或是既无暇又无意跟上理论论争的步子，或是就象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现代的巴塞罗缪集市，却没有可加信赖的向导，眼睁睁望着一大堆“五花八门/没有法律，没有意义，没有

目的”的“恍恍惚惚的混乱”。^① 本书所尝试的，即是通过讨论什么是当今批评论战中的当务之急，分析近年来理论中最引人入胜，最有价值的学说，来澄清混乱，展示意义和目的。

混乱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关键术语的不稳定性。 随批评讨论中专门化程度的高低，及相继出现的相异相抵的因素，这些词汇的外延也在不断变化。“结构主义”一词就是范例。分析罗兰·巴特一篇文章的论者，会把其中专门意义上的结构主义步骤，同其它方法分辨开来，由此理解和输出的都是严格限制的结构主义概念。反之，一个雄心勃勃意欲描述现代思想基本过程的批评家，又会将二十世纪思维的“结构主义”同早些时候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对照，不管你愿不愿意，使我们都成了今天的结构主义者。诚然“结构主义”的这两种用法，都能大致自圆其说，因为某种程度上至为关键的差异，于另一程度上便消陨不见了。如果说“结构主义”的机能，恰到好处地阐明了结构主义意欲描述的意义结构定向，那么，其结果依然是使一切希望这个术语能成为方便且可靠的标签的人，如堕五里雾中。德康布(Descombes)的《自身与他身》是一部追述1933到1978年间法国哲学的力作，它小心翼翼地辨析了种种差异，最后只剩塞瑞一人成了真正的结构主义者。而其他一些论者眼中，结构主义又不仅囊括了最近的法国思想，还包括所有理论化倾向的批评。威廉·菲利浦(W. phillips)在为其杂志《党派评论》撰写的一篇当代批评的评说中，认为凡是打破传统格局，反对阐说作者意图及估价他所获得成就的一切现代批评和理论著作，都可由“结构主义”一词谓之。对此悬殊，我们又该何去何从呢？

显易的办法是摒除此类广义的用法，防止把原应分辨开的东西漫无头绪地拼合一气。当有人声称批评家如罗兰·巴特、布鲁姆(H. Bloom)、布兰克曼(J. Brenkman)、费尔曼(S. Felman)、费希

^① 华兹华斯：《序曲》，(1850)，第7卷，第727-728、722行。

(S. Fish)、哈特曼 (G. Hartman)、克里斯蒂娃和伊瑟都是结构主义者,你可以予以回击,说明他们方法各异,立足的前提大相径庭,欲达的目的判然有别,源出的传统也互不相容,我们对批评理论所知越深,对精确的甄别分析越有兴味,便越能对某些人的愚知浅见一笑置之。这些人将批评还原为纯粹的道德脚本,而把趣味判别束之高阁。餐馆老板声称他有两种葡萄酒,其一为红,其二为白,并不意味着他就是鉴赏家。

称所有理论化倾向的批评都是结构主义者,总体上说是种无知的表现。但“结构主义”的这一用法中亦有潜在的真知——这一点我们可先从总体的层次上来加辨析。这就是说,比较杂色纷呈的文学理论交相更迭,综合连贯的研究,当可导生一个更大的转机,而这一转机的性质也切近结构主义的中心要旨。然而广义上使用“结构主义”的论者,事实上并未有此灼见。他们只是把结构主义同作为新批评笼统版式的人文主义批评作泛泛对比,而后者驻足常识和共通的价值观念,把作品看做倾诉着熟悉的人类忧患的审美成果。对结构主义最为普遍的怨言,第一似是它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来统制文学,如语言学、哲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第二,则是它放弃发掘作品的真正含义,主张一切阐释均等有效,而威胁到文学研究生死攸关的存在理由。

结构主义这两种反对意见的关系尚不清楚。它们甚至能是互相矛盾的,因为人们可以期望某个批评家尝试,比如说通过精神分析来统制文学,以首肯精神分析阐释的优先权。这一两难窘境,也说明我们的眼光须超越我们对文学和批评的假设,从而理解本书中出现的诸流派,把握各种理论与业已被釜底抽薪的传统批评阐释模式之间的联系。其实广义的“结构主义”,其特殊性,并不在它广布四海,且对理论格外偏好上面。时常成为它对立面的新批评,也并非如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所言,意指反理论且局拘一国。区别这一广义结构主义的分野,似在经常为批评活动掩盖的联系之中,其一端是理论范畴的展开,另一端则是审美对象意义

阐发传统程式的解体威胁。新批评的阐释性模态与维护审美自足论攸息相关,它主张防备文学研究为各类科学蚕食侵吞。如果说在试图描述文学作品的过程中,“结构主义”批评展开了各种理论方法,鼓励了某种科学入侵,那么,批评的重心便不再驻足作品栩栩如生表现的主题内容,而移向指意的条件、结构种类的差异,以及意义产生的过程,即使当结构主义者入手阐释之时,其分析作品结构及作为阐释依据的诸学派的努力,亦使人执着于作品与其可能条件之间的关系,从而如结构主义的反对者们所言,损害了传统的阐释规范。

结构主义对传统的破坏见于两种途径,表面上大相径庭,然于结构主义反对者们的眼中,则一样是误入了歧途。一方面,如巴特、托多洛夫或热奈特(G. Genette)的依然主要以文学为参照系的结构主义被斥为形式主义;无视作品的主题内容,而热衷于文学形式、代码和习俗惯例之间的游移不定,似是而非,或分崩离析的关系。另一方面,从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或人类学理论中借用范畴的批评家固然幸免了形式主义之疚,却被斥为带着先入之见曲解作品;忽略作品的主题差异,以求从中发现其学科中某一结构或系统的显形。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两类结构主义者都结缘于其他一些价值体系,而不是传统的人文主义阐释科学。

倘若说,“结构主义”仿佛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术语,涵盖了种种吸收诸理论方法而忽略追索被研究作品“真正”含义的批评活动,那无疑是因为结构主义在更为狭隘的意义上,以它语言学模式的展开,恰是这一批评的重新定向中最能举足轻重的实例。语言学的范畴与方法,无论直接用于文学语言也好,或作为某种诗学的模式也好,使批评家将目光从作品的意义及其内涵或价值上移开,转向意义之所以产生的结构。即使语言学明白无误用来为阐释服务,鉴因它并不提供对句子的新的解释,相反试图描述决定语言学程序的形式与意义的规范系统,这门学科的基本方向,依然是执着于结构,不以意义和关联物为作品的渊源或真理,而仅仅把它们视作语